“阿拉伯之春”：回顾与展望

王锁劳

内容提要：2011年初，北非中东地区发生剧变，突尼斯本·阿里总统和埃及穆巴拉克总统双双下台，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爆发激烈内战，也门总统萨利赫的反对者与支持者对峙街头数月，叙利亚全国到处都在抗议阿萨德政权。不少西方和阿拉伯媒体将这场剧变称为“阿拉伯之春”。本文旨在对阿拉伯之春进行全面分析，并认为阿拉伯之春乃2004年由布什政府大中东民主计划所催生；哈马斯2006年选举上台对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不利影响；当代阿拉伯军人干政和政治伊斯兰势力是影响未来突尼斯和埃及大选的两个关键因素。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例外论　军人干政　政治伊斯兰　土耳其模式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齐德，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阿齐兹的26岁街头摊贩，因无证经营被46岁的女警察法依达·哈姆迪依法没收财物。[1] 随后布阿齐兹来到省长办公室申冤，省长拒绝接见，布阿齐兹一气之下自焚，18天后不治身亡。该事件后引发突尼斯全国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2011年1月14日，在位23年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辞职并携全家逃亡沙特，突尼斯政坛发生剧变。因茉莉花是突尼斯国花，西方媒体将突尼斯剧变普遍称为“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2] 阿拉伯媒体更多称为“突尼斯革命”（Tunisia Revolution）。[3]

王锁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1 曼支·赛义达尼：“点燃突尼斯人怒火的女警察”，载伦敦《中东报》，2011年4月29日。

2 Mona Eltahawy, “Tunisia's Jasmine Revolu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5, 2011.

3 曼支·赛义达尼：“突尼斯革命后的得益者与失意者”，载伦敦《中东报》，2011年1月22日。

在茉莉花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不少阿拉伯国家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埃及群众于1月25日（埃及警察日）开始聚集位于开罗市内的解放广场，经过18天的努力抗争，最后导致在位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辞职。这场政治剧变在埃及被称为“一·二五革命”（January 25 Revolution），同1952年的“七·二三革命”相提并论，[1] 而在西方媒体又被称为“尼罗河革命”（Nile Revolution）。[2] 除了茉莉花革命和尼罗河革命之外，西方媒体还把2011年初春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剧变称为“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3] 本文旨在探讨“阿拉伯之春”这一概念的由来及演变，透视“阿拉伯之春”遭遇的现实障碍和理论困惑，分析“阿拉伯之春”未来面临的艰难挑战和发展前景。

一、“阿拉伯之春”乃美国制造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全球发动反恐战争的同时，酝酿对“大中东”[4] 地区进行全面改造，以便消除中东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2003年3月，布什政府以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名义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当年11月6日，布什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演讲时说：“怀疑民主的人声称伊斯兰传统不喜欢代议制政府，……所有人应该明白，拥有1/5人类信仰的伊斯兰教，与民主统治是相容的。”[5] 布什在演讲中点了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号召领导人进行以“选举”为标志的民主改革。他特别呼吁埃及带头，说：“伟大和自豪的埃及曾经为中东和平指明了道路，现在应该为中东民主指明道路。”[6] 这无异于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不点名的批评。美国政府制定了“大中东倡议”（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GMEI），作为提交给2004年6月8—10日召开的G8首脑会议的工作文件。该倡议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描述了全面改造大中东的计划：“提倡民主和良治；建立知识社会；扩展经济机会。”[7] 其中第一点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他们拒绝了

---

1 艾哈迈德·优素福·盖尔基博士：“一·二五之路通向民主”，载埃及《金字塔报》，2011年2月17日。

2 Editorial, “Egypt after the Nile Revolution,” *Th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1, 2011.

3 Matt Welch, “The Arab Spring,” *Reason*, May 2011.

4 中东（Middle East）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东是指西亚国家加上埃及（埃及横跨西亚和北非，苏伊士运河以西的西奈半岛属于西亚，运河以东属于北非），广义的中东是指西亚加上北非。自2003年起，美国布什政府又提出“大中东”（Great Middle East）和“泛中东”（Broad Middle East）的概念，将南亚的巴基斯坦、东非的索马里等纳入，服务于美国的反恐战争。

5 George W. Bush,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6, 2003.

6 Ibid.

7 Talmiz Ahmad, *Reform in the Arab World,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Regional Debates*,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2005, pp.17-18.

出席G8会议的邀请。

与20世纪70—90年代北非国家自主进行的民主化改革不同，此番美国提出的“民主和良治”属于“西方民主化”的范畴，这种民主以“政治自由化”为核心，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历史传统有较大差距。

与20世纪70—90年代北非国家自主进行的民主化改革不同，此番美国提出的“民主和良治”属于“西方民主化”的范畴，美国在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就是这种西式民主的样板。这种民主以“政治自由化”为核心，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历史传统有较大差距。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沙特国王于2004年2月24日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拉伯国家将继续坚持发展、现代化和改革的路线，但这要与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观保持一致”。[1] 2004年3月，阿盟首脑会议在突尼斯召开，会议结束时发表了“突尼斯声明”，一方面对美国侵占伊拉克和强硬干涉阿拉伯事务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也愿意“加强民主实践，扩大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参与，强化公民社会的作用”，[2] 等于变相接受了美国大中东倡议的部分要求。这种立场反映了阿拉伯国家面对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无奈心情，是美国—阿拉伯关系的真实写照。

2004年3月8日，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成员签署《伊拉克国过渡时期管理法》，俗称《伊拉克临时宪法》。根据该法的规定，伊拉克于2005年1月30日举行了首次过渡议会选举。此次选举是伊拉克政治重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不仅需要从7471名候选人中选出275人组成过渡性质的国民议会，还需要为全国18个省选出748名地方议会议员，其中巴格达省51名，其他17个省各41名。另外，对于库尔德人而言，他们还需要选出一个由111人组成的自治性质的库尔德民族议会。据伊拉克选举最高独立委员会成员阿迪勒·列米估计，约有800万（约60%）的登记选民（总共1420万）前往全国5159个投票站履行了庄严的政治义务。[3] 除了逊尼派总体抵制以外，这次选举过程本身是相对透明和公正的。

所谓的雪松革命，高举的口号是“主权”、“独立”、“自由”和“统一”。前两个口号主要是针对叙利亚的，后两个口号主要是针对黎巴嫩现政府的。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遭遇汽车炸弹袭击，与21人一同被炸死。哈里里遇害引发了黎巴嫩国内持续不断的游行、示威和反政府活动，美国助理国务卿保拉·多布良斯基将其称为“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雪松是黎巴嫩国徽的图案。所谓的雪松革命，高举的口号是“主权”、“独立”、“自由”和“统一”。前两个口号主要是

1 Ibid., p.43.

2 Ibid., pp.46-47.

3 王锁劳：“伊拉克：大选后的难题”，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4期。

针对叙利亚的，后两个口号主要是针对黎巴嫩现政府的。领导这场革命的是黎巴嫩反对派，其核心人物是德鲁兹进步社会主义党主席瓦利德·琼卜拉特。琼卜拉特以前也与叙利亚领导人关系密切，但从2000年开始要求叙利亚撤军，与哈里里结成政治同盟。哈里里死后，琼卜拉特动员黎巴嫩人集会游行，不仅要求叙利亚撤军，还要求拉胡德总统和卡拉米总理辞职。[1]

2005年2月26日，穆巴拉克出人意料地建议，将于当年9月举行的埃及总统选举中，应该允许不止一位候选人参与。穆巴拉克的建议迅速得到了全国的积极反应，埃及协商议会和人民议会分别于5月8日以及5月10日批准了对宪法第76条的修正案，并且经5月25日全民公决通过，支持率高达82%。修正案规定任何总统候选人必须至少赢得250名各类议员的支持，其中包括至少得到140名地方议会、65名人民议会以及25名协商议会议员的拥护。这一规定确保了总统候选人不至于过多和过滥的局面。此后埃及各个政党根据这个新的规定开始了候选人的推选工作，穆巴拉克于7月28日宣布代表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竞选下届总统。[2]

除了这三件事以外，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沙特首次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科威特妇女聚集议会要求得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事情都发生在2005年初春，给世人的感觉是：阿拉伯社会真的开始出现了可喜变化。“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这一概念于是应运而生，从2005年3月开始被西方媒体广泛使用，如《波士顿环球报》于3月10日刊文称：“这些变化被称为‘阿拉伯之春’，批评布什的人是对的，正是布什推动了这些事件的发生。”[3] 澳大利亚《悉尼早报》也发表文章，标题就是“民主的‘阿拉伯之春’应感谢乔治·布什”。[4] 虽然以色列前驻联合国大使多尔·高德（Dore Gold）警告说，现在还不是撰写一部以“阿拉伯之春”为史书一章的时候，甚至连“晚冬”为题都为时过早，但文章作者仍认为不能否认阿拉伯世界已经出现重大变化的现实。一直到2005年底整个西方媒体都对“阿拉伯之春”保持着乐观情绪，然而这一切都在2006年初被哈马斯改变了。

一直到2005年底整个西方媒体都对“阿拉伯之春”保持着乐观情绪，然而这一切都在2006年初被哈马斯改变了。

二、阿拉伯之春遭遇寒流

2004年11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兼法塔赫主席阿拉法特病逝，巴勒斯坦政坛被迫进行重新调整。2005年1月9日，法塔赫领

1 王锁劳：“安理会为何亲查哈里里案？”，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9期。

2 王锁劳：“穆巴拉克的目标：干他30年”，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19期。

3 Jeff Jacoby, “The Arab Spring,” *The Boston Globe*, March 10, 2005

4 “‘Arab Spring’ of Democracy Owes Thanks to George Bush,”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20, 2005

袖阿巴斯以62%的多数票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巴勒斯坦各派要求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上次选举是在1996年1月20日，在总共88个议席中法塔赫赢得了55个席位，当年哈马斯拒绝参加。如今哈马斯表现出了强烈的参选意识，顿使法塔赫面临强大威胁。以色列也感到了威胁，以色列总理沙龙于2005年9月中旬访问美国，要求布什政府不要支持在西岸地区举行选举。但布什政府予以拒绝，国务卿赖斯称："这将是巴勒斯坦进程，我认为我们不得不给予巴勒斯坦人改进其政治进程的空间。"[1]

哈马斯通过选举上台违背了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初衷，给布什政府民主改造中东的努力当头一棒。这也使西方人认识到，在阿拉伯世界推广民主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此后西方媒体很少有人再谈论什么"阿拉伯之春"了。

2006年1月25日，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按期举行，结果哈马斯在选举中战胜法塔赫，赢得立法委员会132个席位中的74席，一举控制了巴勒斯坦立法机构，并获得了单独组阁权。[2] 哈马斯是一个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继承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衣钵，以"安拉（真主）是目标，先知（穆罕默德）是榜样，《古兰经》是宪法，吉哈德（圣战）是道路，为安拉的事业而死是其最崇高信仰"为口号。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不承认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政府签订的奥斯陆协议，它在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哈马斯通过选举上台违背了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初衷，给布什政府民主改造中东的努力当头一棒。这也使西方人认识到，在阿拉伯世界推广民主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此后西方媒体很少有人再谈论什么"阿拉伯之春"了。

在2003—2005年布什政府积极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时，阿拉伯例外论得到了阿拉伯君主和独裁者们的支持，成为抵制阿拉伯民主化的思想武器，成为抗衡"阿拉伯之春"的有利借口。

与阿拉伯之春受冷落的情况相反，"阿拉伯例外论"（Arab Exceptionalism）此时开始受到关注和追捧。它最初出现于冷战结束及东欧剧变之后，当美国思想家福山热衷推销"历史终结论"的时候，人们发现"阿拉伯人仍在抵抗资本主义和对民主制度皱眉"。[3] 在2003—2005年布什政府积极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时，阿拉伯例外论得到了阿拉伯君主和独裁者们的支持，成为抵制阿拉伯民主化的思想武器，成为抗衡"阿拉伯之春"的有利借口。2005年埃及金字塔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撰文，称阿拉伯例外论证明了阿拉伯统治的合理性。他说："围绕在我

1 Michael Herzog, "Can Hamas Be Tamed?" *Foreign Affairs*, Vol.85, Iss.2, Mar/Apr 2006.

2 王锁劳："弱势以色列和强势巴勒斯坦"，载《世界知识》，2006年第8期。

3 Abdel-Moneim Said, "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 *Al-Ahram Weekly*, Issue No.733, 10-16 March 2005.

们周围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依然强大，它们是滋养阿拉伯例外论的主导力量……"[1] 2006年初哈马斯通过选举上台，无疑为阿拉伯例外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更有利的鲜活证据。

2006年秋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伊利亚·哈里克（Iliya Harik）发表"民主、'阿拉伯例外论'和社会科学"一文，系统研究了美国民主推介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受"阿拉伯例外论"的影响及其对待阿拉伯民主实践的立场。他发现，在自由之家2001—2002年度的全球民主状况调查中，有资格纳入"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ies）之列的共有121个国家，包括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冈比亚等非洲国家，却不包括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约旦、埃及、科威特和也门都在实施"选举民主"，似乎并未被自由之家所接纳。[2] 其他西方学者受自由之家分类的启发，研究了"选举竞争性"（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问题，结果发现，民主空白确实仅仅局限于阿拉伯国家。这样，"阿拉伯例外论"就被比较研究所证实了。[3] 2007年秋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管理学教授阿瑟·A. 戈德史密斯（Arthur A. Goldsmith）发表"穆斯林例外论？评估'民主缺口'"一文，将考察范围扩大到全球47个过半人口是穆斯林的国家。尽管他不赞成穆斯林例外论，认为"穆斯林例外论是一个幻想"，"穆斯林例外论的论点是明显的过度简单化"，但他反对布什政府在中东卖力推广民主化。他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点，……在考虑大中东外交政策中民主化的作用时，以下两点十分重要：努力抛开预先的判断；注意看到每个国家的细微差别。"[4]

但布什政府的做法并不是如此，而是将民主化的矛头对准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2005年1月29日，埃及政府逮捕（反对党）明天党主席艾伊曼·努尔（Ayman Nour）。由于是在总统选举之年，这一举动引起布什政府的强烈批评。国务卿赖斯于2月份突然推迟了对埃及的访问，表达对埃及政府的不满。当年12月24日，埃及判处努尔5年监禁。白宫发表声明，批评埃及政府违背对"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承诺"，呼吁埃及政府立即释放努尔。[5] 2007年6月，布什访问捷克，称埃及的艾伊曼·努尔是"被不公正地囚禁"。[6] 布什政府之所以一再批评埃及政府，据中情局前局长海登回忆，是

1 Abdel-Moneim Said, "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 *Al-Ahram Weekly*, Issue No.733, 10-16 March 2005.

2 Iliya Harik, "Democracy, 'Arab Exceptionalism' and Social Science,"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Autumn 2006, Vol.60, Iss. 4, pp.676-677.

3 Ibid., pp.679-680.

4 Arthur A. Goldsmith, "Muslim Exceptionalism? Measuring the 'Democracy Gap',"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7, Vol.14, Iss.3.

5 "Statement on Conviction of Egyptian Politician Ayman Nour," U.S. National Archives, 2005-12-24.

6 "President Bush Visits Prague, Czech Republic, Discusses Freedom," U.S. National Archives, 2007-06-05.

因为布什不相信政策专家所讲的民主对于中东是个例外的说法，他坚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坚持向中东输出民主。2008年海登访问埃及时见到穆巴拉克总统，穆巴拉克猛烈抨击布什和赖斯向中东推广民主。[1] 穆巴拉克对布什政府如此不满，以至于从2004年以后他拒绝访问美国，抗议布什政府对埃及内政的干涉。直到2009年1月布什任满下台，奥巴马担任总统并在当年6月访问埃及之后，穆巴拉克才于2009年8月对美国进行了回访。

奥巴马与穆巴拉克实现互访，不是由于穆巴拉克变得更民主了，而是由于奥巴马改变了对民主的理解。奥巴马是打着变革的旗号上台的，他决心改变布什在中东推广民主的做法，全面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 奥巴马2009年6月4日在开罗大学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选举不等于民主”。他说：“人民的政府为所有掌权者制定单一的标准：你必须通过一致而不是高压维持权力；你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用宽容和妥协精神参与；你必须将人民的利益和政治进程的合法行动置于党派之上。没有这些要素，选举本身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3] 奥巴马这段话实际上批评了布什政府过去数年来在中东民主实践中的错误做法。

三、“阿拉伯之春”能否绽放

2011年初春北非中东地区爆发群众运动，推翻了突尼斯和埃及两国总统。也门群众也于1月27日开始抗议示威，试图推翻在位33年的萨利赫总统。目前反对萨利赫和支持萨利赫的两派群众仍在也门国内对峙，萨利赫的去留暂不明朗。而在突尼斯的邻国利比亚，自2月17日开始在西部城市班加西爆发反对卡扎菲政权的群众运动。卡扎菲政权派军警镇压，导致大量伤亡。2月19日，班加西落入反对派手中。2月27日，反对派在班加西成立“临时全国委员会”，卡扎菲政权前内政部长穆斯塔法·阿卜杜·贾利勒担任主席。此后，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持续激战至今，利比亚陷入全国内战，卡扎菲何去何从难以预知。就在利比亚内战愈演愈烈之时，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又于3月15日爆发警民冲突，造成多人伤亡。随后抗议风潮席卷叙利亚全国各地，示威群众打出“推翻政权”的标语。4月25日，叙利亚政府派坦克封锁德拉市。5月4日，又封锁海滨城市班尼亚斯。叙利亚政局每况愈下，阿萨德总统岌岌可危。

伴随着北非中东的剧变，西方媒体再次欢呼和拥抱“阿拉伯之春”，有些人

1 Ronald Kessler, “CIA Chief Hayden: Mubarak Criticized Bush on Freedom,” *Newsmax*, 02 Feb 2011.

2 王锁劳：“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改善关系‘新观念’”，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12期。

3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Beginning,” the White House, June 4,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cairo-university-6-04-09.

视之为“布什的胜利”，[1] 另一些人视之为“美国的成功”，[2] 意即布什政府当年倡导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当阿拉伯之春再次降临之后，关于“阿拉伯例外论”的评价也再次兴起。金字塔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前主任、现金字塔报业集团董事长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再次撰文，称“阿拉伯例外论基本上结束了，因为民主革命已经来临”。[3]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土耳其人欧麦尔·塔斯皮纳尔发表文章，标题就是“阿拉伯例外论的终结”。[4]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戈登斯通表示：“2011年之前，中东在世界地图上处于唯一一个几乎仍旧缺乏民主的地区。茉莉花和尼罗河革命看起来将要改变所有这一切。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应当可以说：苏丹们的统治正在结束。”[5]

伴随着北非中东的剧变，西方媒体再次欢呼和拥抱“阿拉伯之春”，有些人视之为“布什的胜利”，另一些人视之为“美国的成功”，意即布什政府当年倡导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就理论层面而言，笔者赞成阿拉伯例外论面临终结的看法，毕竟将22个阿拉伯国家作为另类排除在人类历史之外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当今世界处在全球化的快车道上，阿拉伯社会不可能游离于这个潮流之外。此次北非中东剧变由青年人发动和唤起，使用西方民主、自由和平等口号，借用手机、互联网、电视等现代信息工具，充分证明阿拉伯人民的基本诉求与世界人民没有太大差异。但就现实层面而言，阿拉伯社会全面接受现代民主体制，不可能通过“阿拉伯之春”一蹴而就。任何国家的制度变迁注定都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何况在阿拉伯社会还存在着浓厚的“威权主义”传统。当今阿拉伯国家，尤其发生剧变的几个国家，几乎都面临着两个十分棘手的关键问题：一是军人干政传统，二是政治伊斯兰势力。

任何国家的制度变迁注定都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何况在阿拉伯社会还存在着浓厚的“威权主义”传统。当今阿拉伯国家，尤其发生剧变的几个国家，几乎都面临着两个十分棘手的关键问题：一是军人干政传统，二是政治伊斯兰势力。

军人干政是当代阿拉伯社会的普遍现象，阿拉伯威权主义体制大多是在军人干政后建立起来的，阿拉伯共和国领导人几乎都出身于军人。如埃及七·二三革命领导人纳赛尔，利比亚九·一革命领导人卡扎菲，突尼斯十一·七政变领导人本·阿里，苏丹六·三十政变领导人巴希尔，等等。即便是非政变领导人，也

1 Tobin Harshaw, “Egypt's Revolution, Bush's Victory?”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2011.

2 Yair Evron, “An American Success,” *Haaretz*, February 17, 2011.

3 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阿拉伯例外论的终结”，载伦敦《中东报》，2011年3月2日。

4 Omer Taspinar, “The End of Arab Exceptionalism,” *Today's Zaman*, February 14, 2011.

5 Jack A Goldstone, “Understanding the Revolutions of 2011: Weakness and Resilience in Middle Eastern Autocracies,” *Foreign Affairs*, Vol.90, Iss.3, May/Jun 2011.

此次北非中东动荡针对的就是这些坐拥军权而又长期在位的总统或领袖，那么军队的忠诚与否就成为维系政权的头等要素。

大都拥有军方背景。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本身就是职业军人。也门总统萨利赫也是职业军人出身，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曾是参加过反法独立战争的老兵。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虽然属于子承父位，但他也在军队中经历了长期锻炼。此次北非中东动荡针对的就是这些坐拥军权而又长期在位的总统或领袖，那么军队的忠诚与否就成为维系政权的头等要素。

表面上看，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似乎都是被人民群众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所推翻的，实则不然。真实情况是，突尼斯和埃及军队在最后关头，违背总统命令，不仅拒绝向人民群众开枪，而且选择站在人民一边，从而迫使总统下台。与其说两国人民通过和平方式夺取了政权，不如说两国军队通过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实现了政权更迭。阿拉伯军队对于维系政权的重要作用通过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三国事态的发展看得更清楚。也门于1月27日、利比亚于2月15日、叙利亚于3月15日分别爆发群众抗议运动，虽然萨利赫、卡扎菲和阿萨德经历了多次冲击，可是仍然屹立不倒。背后的秘密就在于，尽管有少数军队将领哗变后加入反政府运动，但这三国领导人都拥有忠诚于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都敢于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镇压。也门和利比亚是典型的部落社会，叙利亚属于教派社会，三国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及突尼斯和埃及。突尼斯和埃及属于公民社会，人民的公民意识很强，军队的国家意识很高。萨利赫和卡扎菲长期培养和扶植自己的部落武装，阿萨德长期培育阿拉维教派武装，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状况能够维持多久。

阿拉伯军队的关键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权更迭当中，也体现在政权更迭之后。如今的突尼斯虽然拥有临时总统（福阿德·迈巴扎）、临时总理（贝吉·凯德·埃塞卜西）以及临时政府其他成员，但他们的权威不足以控制那些经历了腥风血雨的革命青年。2011年1月24日当青年们再次走上街头示威之时，武装部队总司令拉希德·欧麦尔将军来到青年人当中，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撤出街道和广场，他说："你们的革命是青年革命，当心失去这场革命而被他人夺去。"他又警告说："武力导致空虚，空虚产生恐惧，恐惧催生独裁。"[1]

与突尼斯相比，埃及军队在过渡时期的作用更大且更直接。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总统在辞职时宣布将总统权力移交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也就是由军队对国家实行军管。该委员会主席是76岁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及军工生产部长侯赛因·坦塔维元帅。此后军方指定了修宪委员会（2月15日），任命了内阁新总理阿沙姆·沙拉夫（3月3日），举行了修宪公投（3月19日），修改并公布政党法（3月28日），批准并公布公投后的新宪法（3月30日）。军方

1 曼支·赛义达尼："突尼斯与军队总司令"，载伦敦《中东报》，2011年1月24日。

的职责应该是在确保9月份举行议会大选和总统选举之后，向新政府移交总统职权并结束军管。埃及军方在一·二五革命前后的表现赢得了埃及人民的高度赞誉和信任，问题是军方是否乐意在大选结束后向民选政府顺利移交大权并甘心回到军营？[1]

这就涉及第二个棘手问题，即政治伊斯兰势力是否打算上台执政或者夺取政权？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长期压制国内伊斯兰运动的发展，1991年逮捕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主席拉希德·加努西，以阴谋推翻政府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后来将其驱逐国外。突尼斯剧变后，2011年1月30日，加努西从英国返回突尼斯，立即开始重振复兴运动党，积极筹备参加7月份举行的议会大选，称他的党打算仿效土耳其正义发展党（简称正发党，AKP）走过的道路。[2] 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期一直遭到高压控制，其成员只能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议会选举，不能以政党形式统一亮相政坛。随着穆巴拉克的下台，穆兄会于2月21日决定建立自己的政党——“自由与公正党”。4月30日，穆兄会任命自由与公正党领导成员，该党副主席伊沙姆·阿尔彦称：该党打算在今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赢得45%—50%的人民议会席位（总席位508）和协商议会席位（总席位264）。[3] 穆兄会进军议会的目标昭然若揭。

军方应该如何对付政治伊斯兰势力的上台呢？一种是阿尔及利亚方式，另一种是土耳其方式。

军方应该如何对付政治伊斯兰势力的上台呢？一种是阿尔及利亚方式，另一种是土耳其方式。让我们先看看20年前的一幕。1991年12月26日，阿尔及利亚举行议会选举，在野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战胜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一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阿尔及利亚军方从幕后走到前台，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总统沙德利，接管国家领导权，废除议会选举结果，避免了伊斯兰政权在阿尔及利亚的上台，但是却引发了长达10年的内战。这就是阿尔及利亚方式，即军方用武力对付政治伊斯兰势力，阻止其上台执政。

所谓土耳其方式，是土耳其军方允许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台执政，给它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土耳其正发党成立于2001年，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背景，它在2002年11月3日举行的第15届大国民议会选举中，一举赢得550个总议席中的363个席位，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席位，组成了清一色的正发党政府。2007年7月22日第16届议会选举，正发党又赢得341个席位，继续单独执政。正发党在台上的这8年多，土耳其经济增长迅速，社会保持稳定，赢得广泛支持。

---

1 Ibrahim A. Karawan, “Politics and the Army in Egypt,” *Survival*, Vol.53, No.2, April-May 2011, p.43.

2 米歇尔·艾布·纳杰姆：“复兴党主席加努西：我们打算组成竞选联盟以便能够夺取政权”，载伦敦《中东报》，2011年4月28日。

3 沙阿班·阿卜杜·西塔尔：“埃及兄弟会宣布任命党的正副主席及秘书长人选”，载伦敦《中东报》，2011年5月1日。

土耳其军方与正发党之间的良性互动，被称为土耳其模式（Turkey Model）。有不少人呼吁突尼斯和埃及学习这种模式，路透社记者艾伯昂·维拉莱贝蒂亚提出，埃及可以借鉴土耳其军人的作用以便顺利实现埃及的民主过渡，还可以借鉴正发党的经验——如何从一个被禁止的伊斯兰政党逐渐上台执政。[1]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桑纳·卡盖提说："土耳其可以给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提供可做与不可做的有用清单，埃及人将决定可以从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中吸取多少经验。"[2] 美国《大西洋月刊》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也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民主的榜样，可以为那些新近自由的国家提供一个作用模式，特别是在从一个混和政体向民主政体演变的时候……"[3]

在即将到来的剧变后的首次大选中，如果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自由与公正党双双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突尼斯和埃及军方将何去何从呢？

显然阿尔及利亚方式提供了反面教训，而土耳其模式提供了正面经验。在即将到来的剧变后的首次大选中，如果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自由与公正党双双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突尼斯和埃及军方将何去何从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Ibon Villelabeitia, "Analysis: Can the Arab Revolt Learn From Turkish Model?" *Reuters*, February 2, 2011,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2/02/us-egypt-turkey-idUSTRE7116P120110202.

2 Soner Cagaptay, "A Turkish Model for Egypt?", *The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6, 2011.

3 Robert D. Kaplan, "Arab Democracy and the Return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7, 2011.